



民国初期 上海戏曲研究

A Study on the Chinese Opera in Shanghai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唐雪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

A Study on the Chinese Opera in Shanghai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唐雪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唐雪莹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7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20438 - 2

I. ①民… II. ①唐… III. ①戏剧史 - 研究 - 上海市 - 民国
IV. ①J8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5829 号

书 名: 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

著作责任者: 唐雪莹 著

责任编辑: 谭 燕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0438 - 2/I · 245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24 印张 425 千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序

近代戏曲一向是中国戏曲史上研究的薄弱环节,最近几年来才逐渐受到了学人的关注,但人们对这一时期戏曲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近代戏曲的改良运动、名家名派的舞台表演艺术上,特别是对京剧这一剧种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而转换角度,对于一定地域的戏曲研究,例如对于上海戏曲的研究,则尚处在分散的状态,还没有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和更深层次的探讨。唐雪莹的这本新书《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正是注重对地域戏曲的探讨,旨在全面系统地研究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的发展状况。到目前为止,对这一时期的上海戏曲做系统全面研究的论文、专著尚不多见,这对于上海戏曲乃至近代戏曲的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也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尚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上海戏曲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一书以1911~1919年的上海戏曲作为关注和研究对象。1911~1919年的上海戏曲虽然只有不足10年的时间历程,但它在中国近代戏曲史乃至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却非常重要。这一阶段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上承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中经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下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戏曲的近代化转型、现代化实现有根本性影响的戏曲改良运动、新旧剧之争也在其中。而上海在开埠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西风东渐的影响,迅速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南北各地的众多剧种和戏曲表演人才纷纷涌入上海,使得上海成为近代戏曲活动在南方的中心,这不仅体现在戏曲理论的宣传和戏曲舞台表演独特的海派风格上,还体现在繁荣的戏曲创作与先进的出版印刷业上。正如研究京剧无法避开北京一样,研究近代戏曲不能绕过上海。无论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还是近代艺术史,上海的戏曲舞台都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关注对象,它对于完整地展示上海戏曲的发展历程,揭示上海戏曲的发展变化规律,深入研究中国戏曲史和上海文化史,科学地评价戏曲在上海都市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在全国乃至世界产生的重大影响,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书的研究分别从五个专题进行:民国前期上海戏曲地域特征研究、“新舞台”引发的演剧革命、《申报》与上海戏曲的近代传播研究、南社与戏

曲,以及海派京剧——传统戏曲近代化转型的典范,总的方向是探讨上海戏曲的发展与社会变革、商业繁荣、西化思潮、地域风情等的关系,揭示民国初期上海戏曲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并通过对海派京剧的解读,重在探讨海派京剧在京朝派雄踞北方之后,如何响应时代的呼唤,紧跟社会的节拍,博采众长,海纳百川,走出了一条成功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为京剧的全面繁荣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当时代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戏曲的前途与命运”问题再次为人们所关注,当今沉寂落寞的中国传统戏曲究竟该何去何从?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实现全球化语境中的再次转型?海派京剧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经验,也为全球化语境中戏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此书在结构上突破了一般史论研究的框架,整体上按照史的线索展开,但在具体的论述中又采用专题形式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探讨,纵横结合,收放自如。研究不仅以资料丰富见长,理论探讨亦有相当深度,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在资料方面,不仅重视纸质文献,同时对有关的影像资料和文物遗址进行了考察,使研究得以全方位地展开,取得更加充实的成果,也更加切合戏曲兼具文学性和舞台性的艺术特质。此书的附录部分对上海近代最重要的报纸《申报》中的演剧资料进行了爬梳整理,既为书稿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为学人提供了尽可能完备翔实的索引,极具史料价值,这也是此书的一大亮点。

雪莹先在曲阜师范大学师从徐振贵教授,攻读硕士学位,继而负笈南下中山大学,师从吴国钦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在两位著名戏曲史专家耳提面命之下,视野日渐开阔,学业不断精进。2007年,她又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与我合作进行博士后项目研究,此书就是她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雪莹特别勤奋,从山东到广东,再到上海,无论酷暑寒冬,哪怕是春节的前两天,总是兴致勃勃地访书读书甚至抄书,许多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经常留下她的身影。“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句普普通通的话,用在雪莹身上,最贴切了。雪莹还年轻,继续虚心地向前辈和同行请教,继续深入钻研,积以时日,在学问上自能达到新的更高的境界。

华东师范大学 赵山林

2012年5月6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民国初期上海戏曲地域特征研究	1
第一节 租界与戏曲	2
第二节 移民与戏曲	29
第三节 商业与戏曲	57
第二章 新舞台引发的演剧革命	85
第一节 戏曲改良运动的蓬勃发展	85
第二节 新舞台引发的剧场革命	95
第三节 新舞台引发的演剧革命	105
第四节 新舞台引发的艺人革命	123
第三章 《申报》与上海戏曲的近代传播研究	137
第一节 《申报》引发戏曲传播的近代革命 ——兼论上海京剧不等于海派京剧	137
第二节 《申报》中的戏曲传播样态(1911~1919)	157
第四章 南社与戏曲	185
第一节 南社人的戏剧改良论	186
第二节 南社人的舞台实践观	196
第三节 南社人捧角之辨	209

第五章 海派京剧——中国传统戏曲现代化转型的典范	222
第一节 京剧发展的三座里程碑	222
第二节 海派京剧的特征	239
第三节 海派京剧——传统戏曲近代化转型的典范	257
 附录一 《申报》1872 ~ 1919 年戏曲资料	271
附录二 民国前后上海戏曲演出场所一览表	329
附录三 1875 ~ 1937 年上海舞台连台本戏目	351
附录四 南社戏曲大事记	364
参考书目	367
索引	374
后记	376

第一章 民国初期上海戏曲地域特征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有一首民谣如是说:“要看中国的两千年,请到西安;要看中国的五百年,请到北京;要看中国的一百年,请到上海;要看中国的近十年,请到广东。”为了追寻并探索百年前中国近代戏曲发展、繁荣的辉煌,在民谣的袅袅余音中,我一路寻找着上海,打开它尘封的史册,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时代的痕迹!

上海——古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海滨小镇,却在近代,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上海的近代崛起,时也? 运也?

作为一座城市,上海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海事政策息息相关。“上海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上海港的发展有着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上海是一个典型的港口城市,它的兴起肇始于海上贸易,以后的兴衰也取决于港口的兴衰。连同城市的扩大和布局莫不与港口的变化有关。”^①历史上的三次开放政策形成了上海发展的三座里程碑。

第一座里程碑:上海镇的出现,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上海”之称。

唐天宝十年(751),华亭县(今上海市淞江故道以南)设置,当时淞江东北的通商大镇青龙镇为重要的贸易港口,后因河道淤塞,难以通航,沪渎的上海浦取而代之,成为装船出海的开放港口和贸易中心,上海镇就此产生,“上海”的名称就这样出现了。

第二座里程碑:上海县的形成。

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上海正式设县,属淞江管辖,此为上海建城之始。但上海并没有因县城的建立而获得进一步发展,随之而来的明代二百年的禁海锁国政策,使它在前进的路上步履蹒跚,枷锁重重。到了清代,上海在百年沉默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发展高潮,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开海贸易,并在上海设立江海关,港口重新活跃,城市日渐繁荣。上海在南北方和海内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人称“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但上海的发展随之因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重申全面海禁,闭关自守而停滞,上海港仍居广州、厦门、宁波之后。

^① 茅伯科、邹逸麟:《上海港:从青龙镇到外高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页。

第三座里程碑:1843年,上海作为《南京条约》之通商口岸正式开埠,从此,上海开始了国际化的旅程。

近代上海的都市化进程,首先是从租界开始的。

第一节 租界与戏曲

由于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国内外贸易中的特殊地位,早在开埠之前,西人就对上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清道光十二年(1832),英国驻广东商馆的高级职员胡夏米(即林赛)和德国籍新教传教士郭士立曾“两次到上海考察,在报告中写道:‘上海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太令人奇怪了’”^①。西人对上海垂涎已久,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上海作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

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领事巴富尔经同上海道台宫慕久商定,在《上海土地章程》中,议定黄浦江以西,洋汀浜以北,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以南地区为英人居留地,“租给英商建屋居住”,占地830亩,这就是后来的租界。《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美国与法国又于1844年逼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取得了在上海通商居留的权利。1848~1849年,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此后不断扩张。上海开埠,租界建立,外商接踵而来,在上海开埠后的一个半月,即1843年12月底,就有25个英商和传教士先后来到了上海。上海的外国人逐年增多,1865年公共租界登记的外侨为5129人,法租界外侨为460人,来沪的水手、流民以及不愿去登记的外侨未包括在内。此后,每年来沪的洋船船员、水手,少则数千,多则万数。1905年,公共租界外侨增至11497人,法租界增至831人;1910年,两租界外侨更增至15012人。这些外侨,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1905年登记的外侨为例,公共租界11497人的国籍分别为:英国3713人,日本2157人,葡萄牙1331人,美国991人,意大利785人,印度568人,法国393人,俄国354人,匈牙利158人,西班牙146人,丹麦121人,100名以下为瑞士、瑞典、荷兰、比利时、希腊、罗马尼亚等国人。^②

租界中除了远洋而来的外侨,还有一些华人,但最初是“华洋分居”,两

① 《鸦片战争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10页。

② 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

相观望,互不相干。租界突飞猛进的发展缘于三次战事:

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起义,造成了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次难民潮。上海及周边县城被起义者占领后,一批本地及周边地区的“衣冠右族”,及惧乱的平民百姓纷纷避入租界,租界的华人由原来的500人骤增至2万人以上。租界的“华洋分居”局面被打破,“华洋杂处”的格局最终确立。

1860年,太平军江浙战事及三次进攻上海,再次引发人口的迁徙与流动,导致了上海历史上的第二次难民潮。比之第一次难民潮,这次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影响也更为深远。

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是上海租界的一次重大变动。因战事而从四面八方涌向租界的难民潮在其中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他们在躲战火、避灾难的生存欲望的驱使下,越过了“夷夏之大妨”,冲破了华洋之界限和中外之隔阂,对近代上海的崛起影响甚巨,上海租界一改往日的荒凉、寂寥而成为繁华之地、十里洋场。正是这些难民的流入,为租界的功能开发和上海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当时避难租界的难民有不少是本地和江南的富绅大贾,他们多携资偕眷而来。“据最保守的估计,从1860年到1862年,至少有价值650万两银元的巨额华人资本流入租界。就上海租界的早期开发而言,这可是一笔极为重要的启动资金。”^①以此为契机,租界商业开始兴起,与之相关的市政建设也取得了飞速发展,侨居上海的外国人把西方先进的煤气、净水技术和设备,及汽车、电车引进到上海,诞生了上海的公用事业。19世纪50年代,上海开始有严格的市政管理;60年代,开始有煤气路灯;70年代,开始有电话,一度通火车;80年代,开始有电灯、自来水。“电火千枝铁管连,最宜舞馆与歌筵。紫明供奉今休羨,彻夜浑如不夜天。”^②至于洒水车、垃圾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有线电台、无线电台、救火水龙、大自鸣钟、书信馆、地下排水系统、气象预报、卫生条例等,无不很早就有。可以说,在整个中国,上海的市政化程度是最高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租界内的城市娱乐行业开始迅速增多。首先是因为太平军在江南地区与清军展开拉锯式激战,江苏、浙江等处的富贵之家纷纷来沪避居,以及常年大量以商贾为主的流动人口,形成了庞大的娱乐消费人群。此外,60年代初,太平军两次进攻上海,城中为文武官弁驻扎之所,屡经戒严,明令禁止一切奢侈游玩之事,租界内却因受西人管辖而禁令不行,于

①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② 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是,租界内茶馆、酒馆、烟馆、妓馆、说书场、戏馆、赌馆等各种城市娱乐场所开始大量开设,并很快超过城内而成为繁华兴旺之区。^①到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上海租界娱乐业已甚为繁盛,1874年《申报》对此有所描述:“七天礼拜,游展如云。几处茶楼,狂朋满座。……书场唱晚,响闻宝善之街。京戏偷看,挤断百花之里。……昔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今则曰:下有申江。”^②

在这些纷纷涌现的娱乐业中,戏曲也趁此挤占市场。各路戏曲入主上海有两种不同方式:开埠前各地方戏主要依随各地商帮的活动向上海地区云集;开埠后,因战乱影响,流浪江湖戏班和各地梨园子弟主要是混杂在难民队伍中向上海租界汇流,“一八六零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昆曲的清歌曼舞的绮梦……给他们喧天动地的架鼓震破了”^③。他们到上海后,纷纷假茶楼、戏园等,以低廉的代价卖艺糊口。这些流徙到租界的戏班和艺人带来了各地的戏曲艺术,使租界形成了多剧种竞奏的局面。

一 租界为戏曲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各项保障

租界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在中国获取的租借地。租界最主要的特点是实行内部自治管理,即成立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担任市政、税务、警务、工务、交通、卫生、公用事业、教育、宣传等职能,兼有西方城市议会和市政厅的双重职能。所以,租界名义上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但其行政自治权使清政府不敢轻易干涉租界内部事务,更不用说派遣军队、警察进驻,也就难以对租界内的行为进行司法活动。在战乱时局下,租界理所当然地成为避难所。租界内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先进的市政建设、相关的规章制度、广大的观演群体,以及西方文化艺术的熏陶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曲的发展与繁荣。

首先,“治外法权”在客观上为戏曲的发展提供了保护伞。

一个地区艺术的发展除了要有物质保证、社会需求之外,还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上海租界号称“国中之国”,它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政治格局,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营造了一个有利于戏剧生存的空间。

上海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政治边缘化的城市。开埠后,上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至19世纪末,已成为“全国通商总汇”、“中国第一大码头”,而

① 《论洋场历年度岁情形》,载《申报》,1876年2月3日。

② 《申报》,1874年3月17日。

③ 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05页。

上海的政治地位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变化。上海给人的印象是,它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人和中心城市,又是中国政治权力的矮子和边缘地带。正如一些西方人指出的那样:“这个城市不靠皇帝,也不靠官吏,而只靠它的商业力量逐渐发展起来。”^①政治权力的弱化尤其表现在租界上。租界作为西学东渐的载体和中介,其独立的政治格局,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管理制度,营造了一个在战乱频仍的近代中国相对稳定的社会空间。“如单以人口来看,上海租界可算是个华人的城市。但如以政治、司法和经济等方面来看,则上海租界又是个外国人的世界。华人在租界社会的地位,就好像是生活在外国人的殖民地一般。”^②社会安定是时代发展进步和人们生活娱乐的一个基本要素,在动乱不已、战火频仍的近代,这一点尤为重要。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几乎每一次战争都没有波及到上海租界。当晚清江南时局动荡,“满天烽火照苏州”时,上海租界茶楼戏园内却另有一番景象,“花街柳巷,雏女妖姬,各色名目,实难数计。酒楼不下百区,烟馆几及千处,茶室则到处皆是,酒肆则何地能无,戏园、戏楼亦十余所”^③。

租界建立以后,设立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工部局(英美等国的公共租界)和公董局(法租界),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甚至还确立了他们自己的课税权和以“万国商团”为名义的驻军权,俨然成了一个“国中之国”。上海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地位,一方面是对中国主权的破坏,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租界内的社会政治局势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和相当大的程度上,阻隔了时局动荡对社会发展,尤其是文化艺术发展的破坏。

上海兵事历经三次,第一次道光时英人之役,为上海开埠之造因。第二次咸丰刘丽川之役,为华界人民聚居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丰太平之役,为江、浙及长江一带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盛一次,后惟庚子一役,政府为义和团所蛊惑,扶清灭洋之声,影响及于南方,租界市面稍受打击。然未几联军入都,而原状回复矣。迄辛亥革命事起,外人默认官、革为交战团体,严守中立,于是避难来沪之人,遂骤增至三十余万,可为盛矣。然则租界一隅,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园,昔《洛阳名园记序》称天下之盛衰视洛阳,洛阳之盛衰视名园之兴废,吾于上海则亦曰,天下之治乱视上海,上海之治乱视租界,盖世

① [美]霍塞:《出卖的上海滩》,纪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页。

② 吴别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版,第37页。

③ 《论上海繁华》,载《申报》,1874年2月14日。

变系焉矣。^①

正是因为如此,“沪江大半是侨民,不少富商与巨绅。总为故乡常不靖,好凭租界稳栖身”^②。每当中国和上海局势发生变动时,租界当局就宣布所谓的“中立”。所以,乱世纷纭中租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上海文化艺术事业的避难所。

其次,租界内一些政策法规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演剧业的繁荣。

(一) 礼拜制度。“礼拜”源于西方社会的“安息日”,开埠以后随着西方传教士、商人来到上海,在六天的工作学习以后休息一天,适时地对生活进行休闲、松弛的调节,这一制度体现了科学性、合理性和人文关怀。“西洋诸国礼拜休息之日,亦人生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形者也。吾见乎西人人工及行商于中国者,每届七日则为礼拜休息之期,一月则四行之。是日也,工停艺事,商不贸易,或携眷属以出游,或聚亲朋以寻乐……闲莫闲于此日,逸莫逸于此日,乐莫乐于此日矣!”^③礼拜休闲好去处之一就是戏园也,“大抵游沪者有七事:戏园也,酒楼也,茶馆也,烟间也,书场也,马车也,堂子也”^④。礼拜制度为人们观戏提供了法定的时间,每逢礼拜日,戏园自然是高朋满座,“七日一礼拜,为西人休息之期。……华人之居停西商者,于先一日礼拜六夜,征歌命酒,问柳寻花。戏馆、倡(娼)寮愈觉宾朋满座云”^⑤。时人曾作竹枝词曰:“第一开心逢礼拜,家家车马候临门。姨娘寻客司空惯,不向书场向戏园。”^⑥又云:“清早纷纷送戏单,新来角色大奎官。恰逢礼拜闲无事,好把京班仔细看。”^⑦

(二) 政治边缘化形成了相对宽松的戏曲政策。1866年1月,英驻沪领事接到上海知县来函,抱怨租界戏园林立,成为不良分子聚集场所,请求在下午6时关闭戏园,并将招牌上的“英商”、“美商”字样除去,工部局总董则表示,“工部局凭着所掌握的情况,认为没有理由干涉租界境内华籍居民无害的和合理的娱乐活动”^⑧。1872年春天,鉴于“烟馆之雇佣妇女跑堂为从来未有之业”,有伤风化,上海道台沈秉成遂在某些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颁令查禁

①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② 《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柄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③ 《申报》,1872年6月13日。

④ 《申报》,1888年6月29日。

⑤ 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⑥ 《申报》,1872年7月12日。

⑦ 《申报》,1874年10月17日。

⑧ 《戏园主具禀》,载《申报》,1875年3月11日。

酒楼、烟馆、茶寮、戏园中的“女堂倌”，但是这项禁令也在租界遭到了拒绝，因而女堂倌照旧在租界各处营生。每当掌灯时分，租界各戏园门前车马纷来，绮罗云集，人们将戏园称为“不夜之芳城，销金之巨窟”^①。葛元煦《上海繁昌记》前有西泠漱华子的《洋汀》，描述了当时十里洋场戏曲演出的盛况：

海天富艳，景物饶人，花月清明，春光醉我。香迷十里，旋开歌舞之场，丽斗六朝，敢续烟花之记。则有地名北里，美集西方，花架堆银，天真不夜，火齐列树，星有长明。杨柳帘笼，送出笙歌一派。……若夫曲艳霓裳，歌舞玉树，记广寒之旧谱，广金缕之新腔。^②

真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咫尺之遥的县城内却屡屡传来各种禁戏令：《学台鼓公严禁淫戏告示》^③、《请禁花鼓戏说》^④、《邑尊据稟严禁妇女入馆看戏告示》^⑤、《道台查禁淫戏》^⑥，以及会馆演戏因观者蜂拥难止而造成看客丧命的消息。^⑦

当然，近代西方殖民者的侵入，绝对不是为了繁荣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但他们带来的西方先进文明，客观上推动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论述英国人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说的：“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⑧

所以，在繁荣发展的城市经济、便捷先进的市政设施、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数量可观的观众队伍的诱导下，原设于上海旧城的戏园逐渐迁到租界，与妓院、酒肆、茶楼、烟馆比邻而设。“若就历史而论，沪上最初之戏园，其地址即在今法租界之戏馆街。地以业名，其热闹可见。……据称戏馆街于三十年前，有髦儿班，有昆腔班，颇极一时之盛。又城内相近处，有一戏班弄，其命名之意以当时梨园子弟均歇宿于该弄。……自市面北移，各戏园亦随集于公共租界之五马路。由五马路复迁里石路、大新街及四马路等处。”^⑨1867

① 葛元煦等：《沪游杂记 淞南梦影录 沪游梦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② 葛元煦：《上海繁昌记》（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③ 《申报》，1872年11月26日。

④ 《申报》，1872年9月14日。

⑤ 《申报》，1874年11月19日。

⑥ 《申报》，1874年11月22日。

⑦ 《上海新报》（第8册），1872年1月18日，第3522页；《上海新报》（第5册），1870年3月24日，第2404页。

⑧ 徐生民：《上海市民社会史论》，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⑨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年,英籍华人罗逸卿在五马路(今广东路)开设的“满庭芳”,是租界第一家戏园,它以京剧为号召,结果“都人士簪裾毕集,几如群蚁附膻”。^①“满庭芳”的成功,刺激并带动了上海租界戏园接踵而起,以至于“梨园之盛,甲于天下”。^②此后,租界先后设立的戏园有法租界小东门外沿城河边的三家戏园:丹凤、月桂为京剧戏园;新北门外吉祥街的宝丰园为徽班戏园,后改名为宝兴。在英租界之宝善街及石路,有丹桂、金桂,亦演京剧。另有满庭芳街重新开张的“三雅园”文班、一洞天的“久乐园”小班等。

上海租界戏园林立和戏曲演出的盛况在竹枝词里有大量的反映和描写,如“洋场处处是逍遥,漫把情形笔墨描。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处处似元宵”^③。

租界的存在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租界的“治外法权”也严重破坏了我国司法的独立,它是一种变相的殖民统治区。租界由于不受中国法律管制,烟馆、妓院等随处可见,尤其是鸦片,成为根深蒂固的毒瘤,摧残着中国人的意志和身体,租界是中国人耻辱的标志。但是,租界也是近代文明的示范窗口,租界相对稳定的环境、先进的文明、开放的观念等,为上海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机。这一切,都是晚清上海戏曲变革、发展、繁荣的前提。所以,我们要客观、科学、历史、辩证地认识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租界的存在。

二 租界中的戏曲革新:女性观演群体

髦儿戏

女伶的出现,最早并不始于近代,纵观中国戏曲发展史,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些关于女伶演戏的零星记载。最确切、最详细的是唐代刘采春家庭戏班的演出活动。刘采春,生卒年不详,据晚唐范摅《云溪友议》记述,刘采春是中唐时的一位女伶,淮甸(今江苏省淮安一带)人,一作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人,伶工周季崇的妻子。她与薛涛、李冶、鱼玄机并称唐代“四大才女”。刘采春擅长演参军戏,史籍中称她“善弄陆参军”(唐人“弄参军”亦谓之“弄陆参军”),深受元稹的赏识,元稹曾有一首《赠刘采春》诗,赞美她“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徊秀媚多”。刘采春尤擅长唱《望夫歌》,“选词能唱《望夫歌》”。《望夫歌》就是啰唖曲,方以智《通雅》卷二十九《乐曲》云:“啰

① 葛元煦等:《沪游杂记 淞南梦影录 沪游梦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② 同上书,第101页。

③ 《申报》,1872年7月9日。

“来罗”，“来罗”有盼望远行人回来之意，据说“采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刘采春的出现意义重大：首先，改变过去参军戏均为男演员的惯例，戏曲史上出现了女子演参军戏。其次，打破了参军戏一味以言词相戏弄的旧形式，加入歌唱与表演。据说，她的嗓音婉转动人，歌声响遏行云，余音绕梁不绝。张庚、郭汉城在《中国戏曲通史》第一编第二章“戏曲的形成”中说：“陆参军的主角曾经以啰唖曲唱过《望夫歌》，这种歌虽不是叙事的，却开辟了参军戏中唱曲子的先例。”另外，尤其难得的是，刘采春组织了一个职业家庭戏班，丈夫周季崇、丈夫的兄弟周季南、女儿周德华，都是职业优伶。她们在唐代越州、扬州一带频繁演出，声名远播。这是民间的女伶演剧，任半塘在《唐戏弄》第一章中称刘采春一家是“民间流动戏班之代表”。^①

更多的则是官僚士大夫蓄养的家庭戏班，多采选一些容貌姣好、嗓音圆润的女孩培养训练之，《海虞别集》卷二《邑人》“钱岱”条云：“姬妾数百，皆美丽姚冶，择其声色尤异者教以吴歈及宋元剧戏。”官僚士大夫蓄养的家庭戏班，历代不乏，但明清时期为多，如安徽人潘之恒笔下的“申班”，即大学士申时行的家班，“邹班”即名宦邹迪先的家班。更有一些审音赏曲之文人雅士，出于自身的爱好，自组戏班，并参与其中，其乐融融，不亦乐乎，如阮大铖、屠隆、潘允端、祁彪佳、吴炳、冒襄、吴三桂、李渔、尤侗、李调元等。张岱《陶庵梦忆》卷八载，阮大铖家班所演之剧，“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②；张岱曾记祁彪佳有“梨园癖”，对家班演员“咬钉嚼铁，一字百磨，口口亲授”^③；清初李渔姬妾组成的“李十郎”家班，曾“游燕适楚，之秦之晋之闽，泛江之左右，浙之东西”（包璿序《一家言会集》）。

另外还有一些被唤作“官妓”的女伶，她们无论在人身还是演剧上都从属于官府，随时恭候官府的听差，没有任何的自由，这就是元杂剧风情戏中经常出现的“唤官身”。一般来说，无论是家庭戏班，还是官妓，她们的演剧都不是面向广大的观众，而仅限于她们所从属的主人或官府，至多只是官僚士大夫之间的相互观赏。在等级森严、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妇女是不允许抛头露面的，真正的商业性女戏班最先兴起于上海租界。

同光年间，上海租界出现了女伶演唱京剧，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髦儿戏。有关髦儿戏历来说法不一，概念混乱，所以我们有必要先对髦儿戏进行

① 任半塘：《唐戏弄》（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

② 张岱：《陶庵梦忆》卷八“阮圆海戏”条，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③ 张岱：《陶庵梦忆》卷四“祁止详癖”条，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概念梳理。

“髦儿戏”名称的由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较为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

其一,髦儿戏最早产生于上海,由同治初年首批南来的京班丑角李毛儿创立。海上漱石生在《三十年来上海剧界见闻录》中说,髦儿戏“始自京伶李毛儿资购贫家女儿之秀慧者,教以歌曲台步,技成演之于绅宦喜庆之家”。李毛儿在上海创建的女子童伶戏班,学艺者都是贫苦人家的女孩,年龄在10岁至16岁,女戏班最初专应富绅官宦家的堂会,李毛儿借此获利丰厚,引发他人纷纷投资创办女戏班。此观点较为流行。

其二,髦儿戏源于幼妓演剧,旧上海对未破身的雏妓冠以“小先生”、“清信人”、“时髦”等名,而对尚未达“时髦”年龄的幼妓则称为“髦儿”。有时妓院为摆排场以讨客人欢心,常邀请同行中尚在训练期的髦儿集中为客人演出,即被叫作“髦儿戏”。这些髦儿中演艺较佳的,常被戏班相中挖走,略加训练后参加剧团演出。这类幼女戏班遂被称为“髦儿戏”,或“髦儿戏班”。

以上两种说法均从演艺者的年龄上考虑。

其三,王韬在《瀛壖杂志》中认为:

教坊演剧,俗呼为猫儿戏。相传扬州某女子擅场此艺,教女徒,率韶年稚齿,婴伊可怜,以小字猫儿,故得此名。沪上北里工此者数家。每当妆束登场,戏锣初响,莺喉变征,蝉鬓加冠,扑朔迷离,雌雄莫辨,淋漓酣畅,合座倾倒。缠头之费,动至不貲,是亦销金之锅也。噫!海上繁华,惨遭兵燹;吴东士女,犹喜笙歌。抚昔感今,能无腹痛?①

从中我们得知两个信息:首先,髦儿戏的性质为教坊演剧,它有各种不同称呼:“髦儿戏”、“猫儿戏”、“毛儿戏”。其次,髦儿戏产生于上海,即“沪上北里”。

其四,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则认为,戏角中有纱帽方巾的角色,因女子扮演男子故名,寓有时髦之意。戏剧评论家张次溪也认为,“髦儿”即“帽儿”,因戏角中有各色纱帽方巾,女子扮演男子,故名。②“沪上髦儿戏,当戏市尚在法租界戏馆街时,已与男班并驾齐驱,则由来盖已久矣。……惟髦儿……则以戏角中有纱帽方巾名色,女人装演男子故名。今普通名曰髦儿,

①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页。

② 张次溪:《梨园琐记》,载《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